

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罗时进主持

# 清代江南城市山林形貌与文人的 自适感会

罗时进

**摘要：**人有对自然的天然向往，这是由于人具有野性这种先天的本真。换言之，野性作为疏世离尘之性，具有回归自然的深厚意味。近世在“城市”不断发展后，野性以“城市山林”为中介趋向避俗之境。“城市山林”是江南文人对天然环境的既视感，其内在追求不在“城市”，而在“山林”，即使在园林精致化的设计中，仍然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为追求。江南的“城市山林”是文人心灵安顿的环境，并成为一种存在方式，这是基于精神层面的“道法自然”。江南文人善于协调自然与自适的关系，既将“自适”作为对天然环境的感会，也将其作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求解。如此可以理解清代江南文人的性情特征和心理趋向。

**关键词：**江南文人；本真野情；城市山林；自适感会

自然地理形态与人文生态具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对文人的审美感会发生直接影响，这是具有普适性的知识，在江南这个区域可以得到典型认知。但审美感会不但生发于自然环境，而且与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与个体身体接触以及审美心理有关，具有多重维度的特征。这些特征的表现有时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异趣。虽然“境生象外”并不可能脱离于“象”，但需要承认精神生态不等于环境生态，审美感会的环境又并非目睹直观的环境——文人立足于自然大地上，但自然大地没有给予文人打开审美宝殿的钥匙，钥匙是文人自我铸造的。

关于江南的叙述，是一个充满生机与趣味

的话题，这种叙述不会由一代人、一批人完成，它将长期存在争议，不断被描写，被分析，被阐述。同一代人的观点有同有异，相同处如一川泓澄，相异处波浪激涌。但江南的历史概念、江南的经济文化、江南的美学特征、江南的文人情怀等，在叙述、讨论的纠缠中不断清晰化，从而丰富了对江南的理解，江南意义的大门被不断推开，对江南文人的心理特质的分析也不断深入。

本文讨论的问题是清代江南文人对城市山林的自适性审美感会。试图说明：人有对自然的天然向往，这是由于人具有野性这种先天的本真。换言之，野性作为疏世离尘之性，具有回归自然的深厚意味。城市山林是文人对天然

环境的既视感,其内在追求不在“城市”,而在“山林”,即使在园林精致化的设计中,仍然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为追求,从“野情自适”的日常生活美学层面,能够透视江南文人的性情特征和心理趋向。

## 一、江南自然地理形态的 “山水林泉”特征

江南与“水”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是自然地理给定的事实,是天形地貌的客观反映。如果说江南的历史是一部《史记》,这是水脉构成文脉的《史记》;如果说江南是一部《通鉴》,这是主要由水提供生存智慧和治理经验的《通鉴》;如果说江南是一部《大典》,这是书写人与水的故事、充满关于水的注释的《大典》。如此解说江南,自然是在理解江南的正确向度上。

在区域理论研究上,美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地域即河川流域”说和日本汉学家、经济史学家斯波义信的“地文—生态地域”说受到普遍重视。相比较而言,后者对前者更具有发展性、辩证性。以斯氏观点来看江南的“地文—生态”特点,确实都与水系有关,按照李伯重先生的分析,主要与太湖水系紧密关联:

太湖水系,古有三江五湖之称。实际上,严格地说应是一河二溪三江五湖。一河,即江南运河,北起镇江,南至杭州,纵贯江南中心地区。二溪,即荆溪与苕溪,是太湖水系的上游和主要水源。荆溪各支流基本上在宁、镇二府,只有少数支流源头出于苏皖交界处。这些支流汇成的干流分别在常州府宜兴县的大浦港与百渎口附近各港渎流入太湖,成为太湖主要水源之一。苕溪各支流也有一部份发源于浙皖交界处,但流域基本上在杭、湖二府境内。这些支流汇成的干流在湖州府德清县流入太湖,成为太湖另一主要水源。此外,荆溪尚有部份河水(约占总流量的10%)流入江南运河,而苕溪河水也约有30%流入黄浦江。总而言之,荆溪、苕溪二河及其支

流,构成了太湖水系的西部水网,并把太湖以西的宁、镇、常、湖、杭五府与东部的苏、松、嘉三府联系起来。<sup>①</sup>

李伯重先生对江南地域的范围界定主八府一州说,与以上对太湖水系的解说正相吻合。而如果考虑到古人对“三江”也有松江、浦阳江、钱塘江,以及扬子江、吴淞江、钱塘江之说的话,<sup>②</sup>那么浙东地区的水脉也能够江南舆图上呈现出来。如此来看,说江南以“水”为突出的地理特征是没有问题的。但客观看江南的天形地貌,又绝不能不注意广袤的平原腹地。事实上,江南平原面积占总面积的50%以上,其余是水域、山地和丘陵,而低山孤丘占太湖流域面积的16%。<sup>③</sup>在科学意义上,“水”“水系”是一个概念系统,而在人文意义上,“山水”“山林”是一个观念系统。古人对江南地理特征的具体感知是意象性的,形诸笔墨往往“山水”一体表现,“山水”往往是“山林”的代称。这里不妨一读赵孟頫笔下的吴兴形貌:

南来之水,出天目之阳;至城南三里而近,汇为玉湖,汪汪且百顷。玉湖之上,有山童童,状若车盖者,曰车盖山。由车盖而西,山益高,曰道场。自此以往,奔腾相属,弗可胜图矣。其北小山坦迤,曰岷山,山多石,草木疏瘦如牛毛。诸山皆与水际,路绕其麓,远望惟见草树缘之而已。中湖巨石如积,坡陀磊砢,葭苇丛焉,不以水盈缩为高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两小峰参差,曰上下钓鱼山。又南长山,曰长超。越湖而东,与车盖对峙者,曰上下河口山。又东四小山,横视则散布不属,纵视则联若鳞比,曰沈长,曰西余,曰蜀山,曰乌山。又东北,曰毗山,远树微茫中,突若覆釜。玉

①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按,说见[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二,[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十九,[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四《水学》。

③ 参见孙景超:《宋代以来江南的水利、环境与社会》,第84页,济南:齐鲁书社,2020。

湖之水,北流入于城中,合苕水于城东北,又北东入于震泽。<sup>①</sup>

吴兴(湖州)区域之内,名山以岷山闻名遐迩,另有杼山、道场山、西塞山、弁山等,山脉相连;水如苕溪、霅溪、夹山漾、碧浪湖、白洲等,水系贯通。一城之内,满目见山,处处溪流,历来得骚人墨客之心赏,有山林清远之美誉。“吴兴山水清远,昔人共谈。盖苕霅交流,名为今之泽国,而苍弁耸峙,实为古之岷中。游其地者,短策可登,轻桡可泛。疏峰秀嶂,迴渚环洲。下映上探,皆成丽瞩。是以延高流之胜赏,流藻咏之遗篇。”<sup>②</sup>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sup>③</sup>,是古人对江南山水相形之美的典型表达。江南的佳地胜景极多,如“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海虞。海虞古城由虞山和尚湖形成山林与湖水一体性景观,七条形似古琴的河流——琴川纵贯南北。元人乔吉《游琴川》云:“海虞雄踞山州,水濼丝桐,路列文楸。铺翠峰峦,染云林障,推月潮沟。”<sup>④</sup>明人吴讷《琴水》诗云:“虞城枕山麓,七水流如弦。昔人肇嘉名,千古称琴川。猗余少年日,结庐住川边。每得琴中趣,不假丝桐传。此意常自知,脉脉无与言。”<sup>⑤</sup>清人王材任《读书台怀古》云:“山水清音胜管弦,层台高峙俯琴川。”<sup>⑥</sup>这样的山水共美的形貌被历代文人记载,歌咏不辍。

这里需要对“城市山林”概念做一个说明。唐代前期“城市”与“山林”有较明显的区隔,“萧然隔城市”“不闻城市喧”“绝迹远城市”是文人的一种避世方法。在唐代盛、中之际独孤及生活的时代,人们仍然持“以城市鄙于丘壑,倦游不如嘉遁”<sup>⑦</sup>的理念。自中唐白居易提出“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sup>⑧</sup>的“中隐”说,“城市”与“山林”虽然形态两分,意识却走向了融通,遁迹山林的愿望可以直接导入城市之中。南宋以后“安居岂城市,避世必林泉”<sup>⑨</sup>的观念没有消弭,但“山林与城市,吾亦任乘流”<sup>⑩</sup>,“入林恐不远,入山恐不深,城市有深远,不必在山林”<sup>⑪</sup>,这成为许多文人的体认。明清时代尤其甲申易代之际,隐居山林而足不入城市是气

节的表征,承平时一般文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模糊了“城市”与“山林”的区隔,城市之内或周边能够栖止隐居、放逸野情之处,皆目为“城市山林”。

江南“城市山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一片宏观风景境域内有若干个中观性的景观。如上提及,吴兴有岷山,明人郑明远《游岷山记略》载:“岷山去郡不满五里,游者非有赍粮远涉之苦,援藤扞葛之劳,人特便之。戊子仲春,予与客乘舟至山麓,山前碧浪湖盖余不溪也,<sup>⑫</sup>自天目南来二百里,过钓鱼山,汇而为湖,广五里许,滉漾澹荡,色如天碧。由山左石磴上至浮碧亭,则自伏虎岩至车盖山,中间峰峦杂出,若

① [元]赵孟頫:《吴兴山水清远图记》,《松雪斋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96册,第681-68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② [清]罗懋修,[清]杭世骏纂:《乌程县志》卷二“山川”序,《续修四库全书》第704册,第2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③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宋]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12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④ [元]乔吉:《乔梦符小令》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737册,第11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⑤ 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名镇志丛书·虞山镇志》,第274页,北京:方志出版社,2017。

⑥ [清]王应奎,[清]瞿绍基编,罗时进、王文荣点校:《海虞诗苑·海虞诗苑续编》,第29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⑦ [唐]独孤及:《送薛处士游庐山序》,《毗陵集》卷十四,民国八年(1919)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清赵氏亦有生斋本。

⑧ [唐]白居易:《玩新庭树因咏所怀》,《白氏长庆集》卷八,民国八年(1919)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日本元和间活字本。

⑨ [宋]朱翌:《陪昆山邑官游慧聚寺》,《潜山集》卷三,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道光三年(1823)长塘鲍氏刻知不足斋丛书本。

⑩ [元]赵蕃:《次韵审知寄来二首》,《淳熙稿》卷九,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⑪ [宋]吕本中:《答朱成伯见赠四首·其三》,《东莱集》卷十二,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景宋刻本。

⑫ 按,“余不溪”即“霅溪”,见[宋]乐史:《乌程县》,《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四,清同治光绪间小溪赵氏红杏山房补刻重印赵氏藏书本。

飞若跃,若卧若趋,争奇角秀。湖南有苏湾,其上村居数十家,桃李如错锦。自浮碧亭而上,有巨石拔土而出,石有大窠,曰洼樽。”<sup>①</sup>海虞则有虞山,以拂水岩景观最为著名,清人汤日新《登拂水岩有嘲》云:“灵山本天镂,拂水非人力。物情顺为美,此独矜其逆。……我来亦行吟,四顾长太息。江湖带区中,润下爰稼穡。溟海王百川,容受浩难测。渺兹飞沫势,成名不以德。负恃在层崖,乘风暂漂激。珠玉诂不佳,盈涸争瞬息。譬彼烟与雾,天霁杳无迹。持此诘山灵,对我应失色。嗔彼相夸者,无乃太迷惑。”<sup>②</sup>与“山林”同样,这些景观也具有山麓与林泉并美的特点,峰岩竞秀、川溪争流构成了具有自然生态特点的江南风景图。

自宋代八景书画书写形成传统后,明清人习惯将一个区域内这类景观概称为“八景”(或“十景”)。如钱塘有西湖八景,嘉兴有南湖八景,桐庐有严陵八景,吴江有松陵八景,杭州城南有吴山十景,阳羨有荆溪十景,等等。八景(或十景)是“城市山林”中划分出的景观,以自然性为主,亦有人文性的,或大或小多凭主观确定,无一定标准,文人一般都有表现其景的诗文。以较大景观为对象的如道光年间许瑶光写鸳鸯湖的《南湖烟雨》:“湖烟烟雨荡湖波,湖上清风送棹歌。歌罢楼台凝暮霭,芰荷深处水禽多。”《瓶山积雪》:“试上瓶山莫畏寒,楼台白玉倚阑干。雪晴海国阳春早,搀入梅花一色看。”<sup>③</sup>以较小景观为对象的如(佚名)写岷山获寺钟音的《钟传清梵》:“竹院萧疏万籁清,坐来几席翠痕生。琅琅钟韵夕阳外,互答山僧渔梵声。”<sup>④</sup>蒋兆兰写荆溪的《买陂塘·阳羨茶泉》:“泛冰瓯、井花如雪,松声何处飞度。名贤遗迹无人惜,秋老白云红树。牵恨绪。幸有个、词仙高唱文房句。空山吊古。喜亭筑红泥,铭镌青玉,更写画图补。朋簪盍,羨煞苍梧小住。词坛三载雄据。罢编桂管题襟集,记辑孝侯风土。心赏处。便相约、扳跻勇夺齐高固。掀髯起舞。待兴极幽探,茶烹阳羨,还作品泉羽。”<sup>⑤</sup>文学家在城市山林中生活,大量的文学作品为江南大地上的风景留下了具有美感的印记。

城市山林中划分出八景、十景等,并以地名冠之加以命名,这种方式是有意识地表明景观连叠、景中有景、山重水复、山水兼美的地貌美

感特征。但理解到这一层尚不够,应当进一步注意这一命名方式与园林化之江南以及江南之园林建构的联系。园林化之江南,是说江南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自然生态性的城市山林风貌;江南之园林化,则是说在江南按照城市山林的审美要求建构出园林嵌入城市之中。这里我们来看一看晚清钱塘丁丙的《寒山旧庐诗跋》:

考“寒山”,本宋韩平原府,后人列为“吴山十景”之一,曰“鹤步寒山”。……山半有白鹿泉,及明通政马三才书“来凤冈”摩崖,李长蘅流芳尝寓于斯。康熙间,孙子奇依山筑庐,榜曰“碧山阿”。……庐之右,为高江村詹事外家傅氏宅。癸卯清和,詹事就婚于此。及贵,增崇华构,以赠妇翁。张涤岑暘《武林志余》载其事。乾隆初,庐归陆典三文谟,号芑洲;搜剔石壁,得文端留题,拓而征和,即此卷也。……咸丰庚申二月,粤匪陷杭城,妇稚仓皇匿水阁下,外蔽板扉。寇虽日至,卒未被燬破。……水阁旁屋三楹,为“来凤堂”,因冈而名。光绪戊寅,赁与凤鹺尹藻居之。元日,不戒于火,庐毁焉,岂“来凤”之讖欤?今惟梁山舟学士石刻“寒山旧庐”及“城市山林”二额无恙;他如“听山楼”,则仅存遗址耳。<sup>⑥</sup>

“鹤步寒山”是杭州“吴山十景”之一,乾隆年间陆芑洲“雅善诗文,酷嗜山水,中年卜居来凤

①④ [清]罗榛修, [清]杭世骏纂:《乌程县志》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704册,第284、7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② [清]王应奎、 [清]瞿绍基编, 罗时进、王文荣点校:《海虞诗苑·海虞诗苑续编》,第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③ 许维格:《许瑶光诗文注评集》,第219-22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⑤ [清]金武祥辑:《冰泉唱和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18册,第537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⑥ [清]丁丙:《寒山旧庐诗跋》, [清]陆森辑:《寒山旧庐诗》,《丛书集成续编》第117册,第577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收录于王国平主编:《杭州文献集成》第10册,第284页,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以下涉及杭州的文献,该书多有搜集,不一具录。

冈之麓”，他拓地建构，即“寒山旧庐”。其“居城南隅，去市不远，而入其庐者，如在山林”<sup>①</sup>。该园墅传至陆氏八世孙，“来凤堂”已毁，而“听山楼”只存遗址，唯梁同书（号山舟）石刻“城市山林”与“寒山旧庐”二额赫然可见。

这是江南自然地貌与园墅建构关系的表征，从中亦可发现地景命名（吴山十景）正是“自然”与“审美”、“天开”与“人造”之间相结合的一个“意识桥梁”。中古以后全国各地称“八景”（或“十景”）之地景遍布，这种景观在清代江南尤不可胜数。这对认识和研究“城市山林”和“江南园林”都有一定作用，对理解清代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美学”亦有重要意义。

## 二、文人对“城市山林”的自适感会

江南文人何以形成“城市山林”的审美偏好，并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美学？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江南地区文人的个别化审美偏好，更非清代江南文人所独有。这是自古以来文人的审美倾向，只是清代江南人在天造地设的环境中更容易生殖、升华这种情趣，且更善于日常表达罢了。

如果以古代山水诗写作作为依据，是比较容易看出文人乐于山水之情的。明代王直说：“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以其质之似也。果似矣，则推而求之，凡景物之美之接乎目而触乎心者，皆可乐也。”<sup>②</sup>这是特定情境的表达，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从追求自适性来说，虽然“凡景物之美之接乎目而触乎心者”皆可“乐”，但“乐”与“自适”并非等同。晚明清初人将闲赏旨趣演绎到极致，宋诒父子之《竹屿山房杂部》、费元禄之《鬲采馆清课》、高濂之《遵生八笺》、张应文之《清秘藏》、屠隆之《考槃余事》、陈继儒之《岩栖幽事》、沈德符之《飞凫语略》、文震亨之《长物志》、谷泰之《博物要览》、程羽文之《清闲供》、李渔之《闲情偶寄》等，将养生之道、闲雅之物、居处布置叙述得相当详备。闲雅可用之物、可行之径几被道尽，但都不如祁彪佳那句说得透彻：“快心娱志，莫过山水、园林。”<sup>③</sup>

美感，从根本上说乃源于自适感。山水为何特别能够给人自适的美感，这与山水的自然属

性有关，这种自然属性是与社会属性相区别的。人，在进入文明社会后，达到一定的文化层面即受到这种文化的陶然和约束；但就其本质来说，又有回归自然、抒发野情逸放心理的内在要求。以山水为乐趣，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也就是那位真正而彻底走向自然的唐代诗人寒山所说的“野情便山水”<sup>④</sup>。所谓“便”者，即宜也，适也，悦也。在寒山心中，野情即意味着自适：“自乐平生道，烟萝石洞间。野情多放旷，长伴白云闲。”<sup>⑤</sup>这代表了一种文人心中潜含意识：只有山水林泉才能寄托野情，开显一种本真的方式安顿人生。

山水中天然具有的野逸的生态因素能够与主体精神冥合交契，满足人身体安逸的生理需要和心理自由的审美需求，从而使主体获得身心的满足和愉悦。当代美国寒山研究学者斯奈德（Gary Snyder）对“荒野”做过这样的定义：“荒野是一个地域，在那里野性的潜能得以充分地显示，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万物可以自行其道，蓬勃发展。……我们所说的荒野实际上是整体的自然界。人类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sup>⑥</sup>当人作为整体自然界的一部分投入并融会于山水自然后，便能够产生无拘无束、自由舒放的心灵状态，这便是与生俱来的“野性”。这种“野性”不分种族、不分时代地与“荒野”联系而存在着：

其实，早在19世纪中期，梭罗就已经阐述了“野性”与“荒野”之间的密切联系。能用英文阅读的读者可能都会留意到，在梭罗的《散步》中“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

① [清]王孙芸：《寒山旧庐诗序》，[清]陆森辑：《寒山旧庐诗》，《丛书集成续编》第117册，第563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② [明]王直：《三台八景诗序》，《抑庵文后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41册，第8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③ [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林居适笔》，《祁彪佳文稿》，第1039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④ [唐]寒山：《自见天台顶》，[唐]寒山著，项楚注：《寒山诗注》，第5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⑤ [唐]寒山：《自乐平生道》，[唐]寒山著，项楚注：《寒山诗注》，第57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⑥ 程虹：《寻归荒野》（增订版），第29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护这个世界”的原文是“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在详述了“野性”对人类身心重要性之后，梭罗指出荒野是培养和维持野性的根基，同时也是人类文化根基：“我走进湿地，就如同走进圣地，那里有大自然的精华和力量。”<sup>①</sup>

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古代山水诗中为什么往往以“野望”为主要视角，而野水、野溪、野渡、野寺、野店、野屋、野桥、野岭、野园、野鹤、野凫、野梅、野芳、野草、野火、野碓这些野趣丛生的自然意象频繁出现。陶渊明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谢灵运说，“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石壁精舍还湖中作》）。陶弘景云，“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黄镇成激赏“野碓喧春水，山桥枕浅沙”（《东阳道中》）的山景；宗渭为“野梅含水白，渔火逗烟青”（《横塘夜泊》）的夜色而沉迷……说到底，都是一种“野情便山水”“野情多放旷”的“野适”情怀。野性源于先天的本真，作为疏世离尘之性，具有回归自然的深厚意味。<sup>②</sup>

还是回到“城市山林”的话题上来。“野性”与“山水”有关，而“山水”与“山林”实为互文。欧阳修云：“夫穷天下之物无不得其欲者，富贵者之乐也。至于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溜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而山林之士视天下之乐，不一动其心；或有欲于心，顾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获乐于斯。彼富贵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乐尔。惟富贵者而不得兼，然后贫贱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sup>③</sup>城市，自非“野”地，只有“城市山林”方具“野色”，可寄“野情”，走进“自适”之境。

杭州武林门归锦桥附近有著名的王氏“养素园”，乾隆十八年（1753）养素园主王钧作《十景旧作序》云：“余卜居湖墅，宅之西有地可五亩，旧为金氏‘友庄庵’。‘养素园’之名，余所新易也。地旧有‘十景’之目，题咏甚多。余力为搜罗，所得无几。阶前老树，多近百年；屋数廛，石数卷，颇称朴野。高贤胜友，倘有当于吟情，惠

以佳咏，俾林泉生色，何幸如之。”<sup>④</sup>显然，王氏“养素园”不但近湖，且园内有老树卷石，林泉生色，其“十景”乃地道的城市山林风貌，王氏最得意者与“华”相对的“素”，亦即“朴野”，这是“养素园”的核心价值所在。齐召南《十景新作序》称其园“人生陶情适性、朝夕可息可游之乐，莫如家园有景，足以豁愁闷而畅啸歌。故虽一亭一沼、一树一石、一花一草，稍堪寓目，即自欣然吟赏忘倦，谓近在左右，足迹不出户庭，时候不拘晴雨，行李器用不计有无全缺，园居无异家居，乐其便也。若夫亭沼高深，树石奇古，花草灵异缤纷，得景不止一二，当时必号名园，后世且仿为图画，问有地背湖山，自为区域；外隔阡阡，中富烟霞；迹因前人，名曰‘养素’”<sup>⑤</sup>。王曾祥《十景后作序》云：“吾于斯园，广不过数亩，吾朝夕得经行焉。有会而兴，时倦而息，山原、林麓无不与吾意亲也；草木、土石、水泉无不与吾情惬也。粲然而有色，吾目不穷于赏也；隐然而有声，吾耳不绝于娱也。”<sup>⑥</sup>山林之野情足以自适，因其地背湖山，自为区域，外隔阡阡，客观上满足了“隐”的条件，能够调适心境，故山原林麓无不与“吾”意亲；而草木、土石、水泉无不与“吾”情惬，如此已道出“城市山林”与文人主体意识关系的奥谛。

与王氏“养素园”文献相比，康熙四十七年（1708）章世丰、章世观伯仲邀请好友王建章、

- ① Henry D. Thoreau, *Wild Apples and Other Natural History Essays*, ed. William Rossi, Athen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p.78. 参程虹：《寻归荒野》（增订版），第294-29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 ② 参罗时进：《前言》，《山水诗选》，第3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 ③ [宋]欧阳修：《浮槎山水记》，[宋]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四十，第103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④ [清]王钧：《十景旧作序》，[清]王钧、[清]王德溥辑：《养素园诗》，《丛书集成续编》第116册，第597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 ⑤ [清]齐召南：《十景新作序》，[清]王钧、[清]王德溥辑：《养素园诗》，《丛书集成续编》第116册，第605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 ⑥ [清]王曾祥：《十景后作序》，[清]王钧、[清]王德溥辑：《养素园诗》，《丛书集成续编》第116册，第616-617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卢之翰、景星杓、丁文衡、王德璘、朱咸、郭用锡、俞起蛰、宋凤池、王嘉澍等在杭城北部梅家桥附近举行“南湖唱和”所存系列史料,对研究文人偏爱城市山林的文化性格更具有启发意义。先看章世观《致书苍启》:

火云天际,未敛奇峰;水阁湖滨,全消溽暑。秋菰猎猎,依稀鸥渚之亭;残照萧萧,仿佛烟波之观。虽隔岸倾颓古寺,剩有荒凉;而开窗滟潏南湖,适当佳胜。拟因此地,暂屈名流。运笔阵而摩空,快文澜之倒峡。但人亡物在,重游恐增此愁怀(水阁为君亡友故居);然草长台荒,明日反添君诗料。彩笺谨达,文旃须临。<sup>①</sup>

再看章世观《致东郊启》:

曾闻古昔招裴迪而入山林,何事明晨屈东郊而来尘市?盖灵鹫烟霞,描摹殆遍;南湖风月,吟咏未经也。此地原为锦绣之名园,近作榛芜之废寺。连云百雉,横夕照而依微;狎水群鸥,弄残烟而荡漾。临流剧饮,足散闲情;对景联吟,偏多佳句。锦袍未夺,专看之问之来;木榻犹悬,伫待南州之至。鱼书此附,蜡屐随过。<sup>②</sup>

章氏伯仲此次邀请同人雅集地点原为“曹氏荒园”,后成为南宋时张俊(循王)故第,称“玉照堂”。那么,为什么不邀同人去灵鹫烟霞雅集,而来南湖风月景点呢?表面来看,道理似乎很简单,是因为“灵鹫烟霞,描摹殆遍;南湖风月,吟咏未经”。其实,更深层的是文人“城市山林”之“欲”起支配作用。这里,蔓草离离,榛芜丛杂于废园;烟残寺颓,剩有一片荒野。然而恰恰“草长台荒”,能够“反添诗料”,这便是“荒野”与“野性”对文人的内在感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真切地听到了“野性的呼唤”,看到了“山林”对清代江南文人灵魂安顿的作用。

### 三、园林作为真山水替代物的审美意趣

在江南“城市山林”的大地上建造基于文

人心理与审美理想的园林,是一个必然趋势。但园林具有物质性,建造园林当与经济发展、物质条件改善同步。童寯《江南园林志序》所谓“吾国凡有富宦大贾文人之地,殆皆私家园林之所荟萃,而其多半精华,实聚于江南一隅”<sup>③</sup>,这一论述切中肯綮。

论江南园林必论吴地。《宋书·戴颙传》载,南朝戴颙“出居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这是见诸文字记载的吴中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家族园林。但直到宋元时期,吴地的家族园林并未可称盛,其勃兴是自明代中期以后,正如沈德符云:“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sup>④</sup>明清两代,江南私家园林建筑进入鼎盛时期,叶梦珠回忆明末清初江南园林建造的情景:“余幼犹见郡邑之盛,甲第入云,名园错综,交衢比屋,阡陌列廛,求尺寸之旷地而不可得。”<sup>⑤</sup>何良俊记载明嘉靖以来江南竞修园林的情形云:“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sup>⑥</sup>吴地文人通过科举之途入仕者众多,“士大夫解组之后,精神大半费于宅第园林,穷极工丽,不遗余力”<sup>⑦</sup>。

明代苏州府属地家族园林约有二百五十多处,而在明成化前只有约四十处,约占百分之十五,且几乎没有有什么知名园林,可以说苏州绝

- ① [清]章世丰辑:《南湖倡和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16册,第551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按,书苍即卢之翰(字天宇)。
- ② [清]章世丰辑:《南湖倡和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16册,第551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按,东郊即宋凤池(字陞升)。
- ③ 童寯:《江南园林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53册,第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 ④ [明]沈德符:《玩具》“好事家”条,《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第6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 ⑤ [清]叶梦珠撰,来新夏点校:《居第一》,《阅世编》卷十,第20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⑥ [明]何良俊:《西园雅会集序》,《何翰林集》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2册,第109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 ⑦ [清]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12册,第7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大多数园林都是明代中期以后构筑的。<sup>①</sup>据相关记载,苏州大小园林迄至清末有三百多座,<sup>②</sup>从数量上看增长并非很大,<sup>③</sup>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清代大型园林纷纷出现,成为重要的文化地标。谢元淮曾描述:“吴下园亭最胜,如齐门之吴氏拙政园、阊门之刘氏寒碧庄、葑门之瞿氏网师园、娄门黄氏之五松园。其尤著者,每春秋佳日,辄开园纵人游观。”<sup>④</sup>除这些规模较大的园林外,更多的是文人化的轩阁亭林,清人朱愚溪在苏州城南建有墨庄,主体建筑为高轩,轩前嘉木、叠石、绝壁,浑然一派山林风景。康乾年间长洲诗人李果《在亭丛稿》有《墨庄记》云:“轩之北墙外为崇阜,当风日晴朗,云霞澄鲜,遥望西北,秦余、穹隆诸山,浮青翕黛,披襟挹爽,其境若与书卷相融洽;非必骛远凌危,夸奇竞秀,以求嵒岩穹谷于数十里之外,此岂易得哉?前辈谓文人未有不好山水,盖山水远俗之物也。俗者与道相背,俗远而后可以读书研理,可以见道。”<sup>⑤</sup>

明清时期江南各地建园风气都极其兴盛,范濂《云间据目抄》曰:“迄今四十年来,士宦富民,竞而兴作。朱门华屋,峻宇雕墙,下逮桥梁禅观牌坊,悉甲他郡。”<sup>⑥</sup>需要注意,“空间正是营造过程中的行为本身,比如景观的改造行为;也正是通过这类行为,空间才被人类所拥有”<sup>⑦</sup>。人类营构和拥有某种空间总是基于某种目的,嘉、隆之后园林成为江南富庶地区士绅、富民阶层财富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为,这违背了远俗、适情的追求。这提示人们在看待园林这一特殊的“城市山林”的时候,需要做出资本行为和文化行为的区分。但客观地说,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江南士绅甚至包括富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文化创造者或接受者的素养,“适性”作为深沉文化心理最终起到主导作用,在最大程度上回归“城市山林”的本源特征。

西蒙·沙玛(Schama, S.)在《风景与记忆》中说:“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sup>⑧</sup>而在物质形态中将这种想象结构变为可能的是什么呢?是设计和技术,正是渗入和体现充分文化内涵的设计和技术,使近世江南园林在总体观照和局

部构建上都充分显示出文人化特征,标识出江南文人的性格、情感和审美趣味,最集中地体现其“适性”的精神追求。这种设计和技术的境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和理解。

一是营构立基。《园冶》曰:“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sup>⑨</sup>顾文彬《过云楼家书》云:“凡园屋有高爽旷畅之处,必更有深邃幽密之处。一宜于春夏秋,一宜于冬,缺一不可。”<sup>⑩</sup>私家园林与公共游豫园林的性质不同,有居住功能,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联,而待客雅会、消寒消暑、读书进学,亦主要在室内进行,故厅堂屋宇为必要之基本建筑。当然,因园墅有不同规模,立基本身也有总体设计的意义,《园冶》所谓相地、立基、屋宇、墙垣,四项内容其本都在立基,甚至次第亭榭、相连回廊都与厅堂、屋宇布局有关,故立基既有日常生活的实用性,也有合于自然的审美性。昆山顾氏玉山池馆在江南具有典范意义,四库编臣曾简要介绍其立基规模:“其所居池馆之盛,甲于东南。……曰玉山堂、曰玉山佳处、曰种玉亭、曰小蓬莱、曰碧梧翠竹堂、曰

- ① 参郑文:《江南世风的转变与吴门绘画的崛起》,第60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
- ② 参柯继承:《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社会风情》,第156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8。
- ③ 明清两代苏州府属地区共有多少园墅,统计不一。清人冯桂芬所纂《(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五至卷四十八《第宅园林》,计吴县239处,长洲县52处,元和县114处,昆山县103处,新阳县33处,常熟县97处,昭文县18处,吴江县65处,震泽县33处,总计754处。这里“第宅园林”显然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
- ④ [清]梁章钜等撰,白化文、李如鸾点校:《楹联丛话》卷六,第81-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 ⑤ [清]李果:《墨庄记》,《在亭丛稿》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册,第281页,济南:齐鲁书社,2001。
- ⑥ [明]范濂:《纪土木》,《云间据目抄》卷五,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
- ⑦ [加]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第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⑧ [英]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冯樾译,第6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⑨ 张家骥:《园冶全释》,第200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
- ⑩ [清]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485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16。



湖光山色楼、曰读书舍、曰可诗斋……”<sup>①</sup>吴县木渎有吴氏遂初园，“经邃室，循修廊，西折而面南者，为拂尘书屋，深静闲敞，林阴如幄，于休坐宜。经桂丛北迤，有亭翼然，俯临清流，为掬月亭，倒涵天空，影摇几席，于玩月宜。自亭而东，随堤南折，沿石齿度略约，为听雨篷，宾朋既退，船窗四阖，风摇枝柯，飒飒疑雨，于夜卧宜。东望为鸥梦轩，主人息机，物我偕适，于徙倚宜。又东迤为凝远楼，登楼四望，娃宫西峙，五坞东环，天平北障，皋峰南揖，余若齿若奔，若倚若伏，苍烟晴翠，斗诡献异，胥入栏槛，于眺览宜。楼之东为清旷亭，绮疏洞开，招纳远风，于披襟宜。亭皋南折，回旋冈岭，拾磴级，穿梅林，耸然而高者为横秀阁，东北送目，平田万顷，纵横阡陌，绿浪黄云，夏秋盈望，于观稼宜。其他平室深窝，交窗复壁，敞者宜暑，奥者宜寒，约略具备”<sup>②</sup>。“宜”的核心要义即“物我偕适”，适性，是园林美学的最佳境界。

二是叠石理水。叠石以掇山，凿池而理水，是园林建造极为重要的环节。造园之手笔是否精彩，关乎城市山林能否成型，自然意趣能否产生。在江南，几乎没有不叠石、引水之园林，而品质高下、雅俗之分亦多见于此道。无锡钱氏寄畅园（秦园）“有泉从惠山淙淙灑灑，注为清渠，日夜流不涸，小水澄泓，分为细涧，并涓洁可爱……园中位置，大都峨然奇拔者为峰峦，窅然深靓者为岩洞”<sup>③</sup>。秀洲张氏涉园为浙西名园，为清初张惟赤归田后，疏泉叠石，拓基广地而建，其叠石理水可谓极尽自然天工。“希白池淳泓涵蓄，其源来自山岩间，琮琤曲折；为滩为渚，为桥为涧；穿林度壑，随处可赏，则水泉胜也。翠照、流波诸峰，备极奇诡；高者触云，低者临水；苍藓绣涩，紫苔斑斓，则石胜也。”<sup>④</sup>相比较而言，孙家桢之小灵鹫山馆规模较小，然山水之致甚佳：“流泉宪鹤，叠岫规龙。若将飞而未翔，危峰壁立；如侧睇而欲下，别岭云来，此小灵鹫所由名焉。其下曲沼镜开，文阑篆引。缀以水榭，榜曰‘留云’。嵌壁古碑，墨香喷溢；聚沙碎石，文藻萦纡。乃折迂途，遂为虚窟。凿坏思逸，拟赋招隐之诗；舍绂厌荣，颇得同岑之契。若夫零雨送籁，劲风鸣柯。抗吟而山谷成音，流咏而竹石俱裂。落花无际，良夜自凄，有如‘啸秋亭’焉。幽

芬霭空，积素粘袂；淡月留影，澄波写妆，曰‘香雪岩’。数尺石梁，寻径而下。短吟倚柱，击铜钵而俄催；素魄窥帘，共银河而倒入。加以澄潭蓄翠，古井不波。导饮有源，鉴空无滓。则‘倚月吟廊’之下，‘在山泉’见焉。”<sup>⑤</sup>显然其整体设计就是以“招隐”“思逸”为取向。

三是植木莳花。林木，同样是城市山林的构成要素。清人张英尝言：“园林之胜，不能兼者六事：务宏敞者少幽邃，人力胜者罕苍古，具丘壑者艰眺望。欲兼此数者，则又有三：一水泉，一石，一林木。”此三者之中，“乔柯古木，臃肿轮囷；干挺十寻，阴笼数亩。园林得此，如端人正士，垂绅正笏于岩廊之上；又如古君子仙人相与晤言寝处，可瞻仰而不可褻玩，风雨寒暑皆作异态，洵园林之宝也。然非养之百年，贻之奕世，则不可猝得；东坡有‘仓皇求买万金无’之叹，则林木为尤难”<sup>⑥</sup>。掇山、引水皆不易，然而最不易者当属植木。园林中若无林木，则无荫蔽，且乔柯古木亦有古君子仙人的象征意义，能够显示园囿及其主人之精神，而江南以林木蓊郁、植被茂秀为特色，园林中自不可缺。文震亨《长物志》有《花木》专论，李渔《闲情偶寄》有《种植部》，清初秀水曹溶有《倦圃莳植记》三卷，“记其圃中所有，分花卉二卷、竹树一卷，各疏其名品故实及种植之法”<sup>⑦</sup>。归安张应昌《清诗铎》为《树艺》立目，其中《吴趋吟》“点缀白石盆，咫尺丘壑趣”<sup>⑧</sup>一句描写盆景颇有意味。山阴张

① [清]永瑢等：《玉山名胜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第17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② [清]沈德潜：《遂初园记》，《归愚文钞余集》卷四，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教忠堂刻本。

③ [明]屠隆：《寄畅园纪略》，[明]王永积：《锡山景物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4册，第467页，济南：齐鲁书社，1996。

④⑥ [清]张英：《涉园图记》，[清]张鹤征：《涉园题咏》，《丛书集成续编》第117册，第47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⑤ [清]陈璠：《小灵鹫山馆图记》，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嘉兴历代碑刻集》，第6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⑦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六子部二十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⑧ [清]邵长蘅：《吴趋吟·种花》，[清]张应昌编：《清诗铎》卷六，第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筑基建屋，“前后空地，后墙坛其趾，西瓜瓢大牡丹三株，花出墙上，岁满三百余朵。坛前西府二树，花时积三尺香雪。前四壁稍高，对面砌石台，插太湖石数峰。西溪梅骨古劲，滇茶数茎，妩媚其傍。梅根种西番莲，缠绕如缨络”<sup>①</sup>，其屋以“梅花”为名，可谓用心。

文化成为传统便有延续的生命力，江南人对“城市山林”的偏好是渗入心灵的，一旦条件成熟便会顽强地表现出来。晚清虽然那些“叠房架屋，殊无缭绕致”的园墅“可惜许多银子”<sup>②</sup>，但总体上来说“城市山林”的特色得到保持，深入地看，晚清江南不少园林在美学层次上有所发展。苏州城西北隅有五亩园，历史悠久，道光年间为叶氏购得，称“叶家花园”，咸丰初因家道中落鬻于潘氏，旋遭太平军兵燹，湮没殆尽。光绪十五年（1889）由谢家福率人修葺，梅坞、杨柳堤、双荷花池诸胜重又焕发山光水色，“林泉之广十倍其数”<sup>③</sup>。光绪七年（1881）俞樾在西湖孤山西麓作俞楼之役，数月而成，“亭台之盛日加，泉石之胜亦日出”，其格局、风格都是“城市山林”化的。

顾文彬在稍早于俞楼建造怡园时，请著名画家任薰主持园图的绘制，顾氏在日记中写过一篇园林小赋云：“不山而岩，不壑而泉。不林藪而松杉，不陂塘而菱荷。携袖中之东海，纵归棹兮江南。或谓文与可之笈笥谷，或谓柳柳州之钴钿潭。问谁与主斯园者，乃自适其适之良庵。”<sup>④</sup>这段简短文字，正是对“城市山林”之“野性”美学理想和情怀的生动诠释。

#### 四、余论

江南“城市山林”遍布，是灵秀天钟的风土。<sup>⑤</sup>明清两代，尤其有清一代，幽静清嘉的山水，自然经济的发展，闲雅精致的生活，一方面酝酿出追新逐奇的心态，另一方面又滋生出“向隐”的性情，蒸育出特有的江南式的隐逸风气。“隐”可以理解为行为方式，而“逸”则是目的。

清初以降，江南文人虽然不断受到优渥待

遇，但内心深处仍不同程度上持有“虽居市廛，如处岩壑”<sup>⑥</sup>的城市山人心理。江南隐逸阶层是一个有形无形的庞大聚型，在这里文人不断寻求“野适”的存在方式，而“城市山林”无疑是最佳的安顿，也自然成为最符合生活需求和审美要求的向往。

“城市”与“山林”，形而下地看，其物形之、势成之似乎具有对立的意向，但是在“道法自然”的形而上层面，这两重分化可以融贯统一。如果理解了所谓“道以自然为法”之实质就是“道以适我为法”的话，对这种分化与统一就不难理解了。如是可知，“自适”是江南文人对天然环境的感会，也是江南文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求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代江南文人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16AZW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罗时进，苏州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唐宋元明清诗文、文献学、地域文化。

- ① [明]张岱：《梅花书屋》、《陶庵梦忆》卷二，第24页，长沙：岳麓书社，2016。
- ② 按，如松江有灵园（即曲水园），为邑中胜景，“然叠房架屋，殊无缭绕致，王梅影观察兴尧来游，叹曰：‘可惜许多银子。’”见[清]诸联：《明斋小识》卷六，《笔记小说大观》第28册，第46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 ③ [清]谢家福：《五亩园记》，衣学领主编，王稼句编注：《苏州园林历代文钞》，第12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 ④ [清]顾文彬：《过云楼日记》，第311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按，良庵为顾文彬别号。
- ⑤ [清]沈德潜《吴趋行》：“吴趋美风土，灵秀天所钟。”[清]沈德潜：《竹嘯轩诗钞》卷十一，清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
- ⑥ [明]姚广孝《韩山人诗集序》：“吴郡韩奕公望，为人端雅纯正，读书通经安命，诸子百氏靡不博究，虽居市廛，如处岩壑，足迹未尝及府县之门，交游唯喜山林之士。”见[明]韩奕：《韩山人诗集》卷首，清抄本。